在边缘保持完整的，是存在的可能性

Aldo Poblete Varas

感知地图很难，而将自身置于其中更难。现实的延展能够把你变成一台机器，却永远无法把你变成一个模拟的神。一个时刻的特征，也能用来解释它，并在解释中使它复活。一条新颖的线为自己打开了一个位置（突然），这件事原本并未被计划，但所有人都相当高兴它发生了。事物有时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前进。一条用以前行的线，整段发展的概要，一种独特而同时又不足的压缩。背对着解决问题。我们身处森林，赛博格已经安置于繁叶覆盖的土壤之下，留意着科学，也留意着思辨。重要的是人想在每个微小空间放入多少颜料。这是一种属于哲学家瞬间的力量。一切都能追溯至剑与所用词语的瞬间。

机器能够开创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能够复制那个已在那里构造好的世界。红色Middlemist。世界上空的翅膀，那究竟是怎样一位飞行员，竟在我们之中激发出如此多的东西——假如我们称为灵感的东西有任何意义的话。对技术之物的激进接受，没有显见的批评：真正的精密，只可能出现在巨大创伤，或巨大而无法概括的代际丰盛之后。地质怪物的碰撞将我们放置在这条大道上，观看好心人士送往印刷机的新手稿。这个地方，似乎起源于一个不同于我曾读过的那个大陆。人类思想拥有一种奇特能力，能够层层积聚，创造意义。

太多时候，恐惧与阳刚的缺乏，曾伪装成精密。单纯的回忆就足以让我们的力量以特定方式重新组织，以与人类劳动、与奢侈品工业最实际的一面和解的方式重新组织。看过那些报价之后，我们唯一能够提取的，是一种巨大的耳聋；它折磨着那些本应保护我们的人的计算能力。我们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观察投入了多少工作来出版那些不该写作的作家而得到解释。尽管有人想暗示某种结局，除了来自沉默的体面之外，再无体面。

毁灭一切、每一个可能的克、每个名字与每个细节：如今，所有这些都被宣告为不可能。社会的显现在其中投降的恭顺，一种自私，一种处在曾为死亡者之中的谵妄。Ninhursag。尖叫与叫嚷，无法看向更远，你什么也没看见，必须由特拉克尔先来吗？认

识论的造访与地下的X光照片；艺术与物质性交织到一种层次，再也无法断言任何最低限度的冗余。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总体性，竟只能通过闪现、通过互为镜像的碎片来建构?

尽管侵入的目光加速了眩晕，却无逃逸的能力，也无逃逸的感觉，力量被遮蔽。我不必弃船，就能对每一个神说出我认为其各自应得的话。在苦痛与宇宙惊惧之间，我摆弄过几个概念，以及几种接近存在者未来的残酷方式。每一种痛苦，每一片记忆，一切都进入一块惰性材料。冬天：灾祸意味中的色彩与力量，以及不完美却神圣的圣像。夏天：另一个时间或许更好，但此刻我们住在尚未屈服于围攻的堡垒里，我们仍在呼吸。秋天：游戏与本体论的动因，一张木偶与感受性的网络，勉强能在不失足的情况下行动。

如果文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没有谁能质疑声音或氛围可能散发的东西。我们太有耐心了，那曾是我们的原罪。我们善意地接受了所有端上我们餐盘、摆上我们桌面的混乱与苦难。如今所期待的，是审美的、学科的空间的打开，好让另一种接近表象之现象学的方式得以出现或涌现（与悲剧的一切可能性相悖）。称它为传闻或嘲弄吧，调遣已经呈上，思辨视域已经口授其最初的字母，甚至完成了最初的非平凡方程。所期待的是（来自白光），那个由电缆与（数值）图式构筑的怪物，将自行打开讨论空间。

显然，厚颜无耻的观念已成功扩展，而‘幽默’的观念已失落于彼岸。细腻而平坦的空间之间，没有有死性；真理位于承诺与理想演进的边缘。数字性形式的清新。想活在奢华与根茎之中的人，必须使文本置身于意义与戏剧想强迫它吞下的控制之外。意义的疾病与道德思辨。以未知格式吠叫，能够打开理论的这一地段，使其麻木，并为那已构成为规范的新转向分配一个新回声。

形式如今取决于存在者揭示一种相伴宗教的可能谵妄的能力。文学无需获救。第一件事应是不向哲学期待任何东西；反之，就意味着不可原谅的天真与脱节。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站在入口之外，请哲学家给出两三个不逃跑的理由；他无力说出任何连贯的话，在那些他认为与此有关的重要书籍中，也什么都没找到。问题不在于哲学家的角色是否已过期。这里重要的是，知道谁或什么将接过火炬，继续行进。

村上这样的人可能说什么，并不十分重要：身体的效应能够超越雪与失落书写的轻盈。转折：你可以进入网络，却一无所获，没有任何最低限度吸引人的东西。现实有时显得稀释，不愿提供任何一片花瓣、任何一个引人注目的小片段。处理‘引人注目’的问题，及其与‘吸引人’的差异，需要数百万页；那将是一场拉康式悲剧。每个神最大、最深的欲望，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教育，作家也如此感受。艺术与宗教的区分，无关紧要。

天照可以这样，从她在历史之外、在意见与异议之外的位置说话。但这里的机器想要说话，它们说：‘我们将怨诉倾倒给你们，因为你们想让我们远离源头，你们想让生成抹去我们刚刚落败的存在。’从微不足道的准则出发，我们拼装一部想逃出其自身历史性的历史；我们想将一块布倾覆在时间之上，它一旦铺下，就会向四面八方延展，填满地平线每一处可能空间。打开代码，打开代码，以便能够安然关上门。

一扇门自称‘影子’，另一扇他们称为‘图像’，而第三扇，无人能够为它取任何名字，因为每个名字似乎都为它能做出、能建构的东西给出错误图像。一种从文学中切除的哲学的总体性，在我们看来平庸而且最终适得其反，因为众所周知，合理之物的边界早已被（容我赘言）实验科学移置。我们到底在谈怎样一种思想？当所关涉的是一种身在自己家中的哲学，当我们所能谈论的仅限于经验的单纯问题时，这问题就是多余的。

风险不是善、也不是自由意志的敌人，但它与要素的恒定有所冲突。在黑暗森林里，那些历史文字与意识无限的黑色混淆。真理与谎言身穿王者盛装赴宴，而往昔的崇敬，如今已让位于速度、让位于消除一切障碍的努力。某些异兽能够生活在诗歌之中。一切生命形式，一切让生成覆合于社会思想古老花朵之上的理由。在大大小小的机器的细节之中，那种能够恰当面对一个充满因素之时代的思想弥散开来，以及所有手稿、替代物、笔记本及其开启与任性。

手稿作者的版本，已成为直接行动的人质，荣耀之感如今高过那座触及地狱边界的山。恰当的衣着，往往在行动开始时消失。一切协同行动都缺乏艺术，也正因此，它或许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唯有计算机化的行动打开实体，使它暴露，将它从自身那些以保护为借口、实则只让它无用的部分中解放出来。所有花朵都为书籍、为清醒的行者开放；他们安静、面无表情，却穿行于空间，在墙壁上留下压印的微笑，在共同体的伦理气质中留下精神标记。

街道，灯光与信息的小垃圾堆，将那些经不起风雨的意志推回。如果我们除了建构集体图像之外别无命运，那图像就会是一切，它会自给自足，犹如那没有匮乏的东西。社会曾期待（至少公共话语似乎想如此传达），技术进步会通过清晰分明的结构、不言自明的机械过程，在现实中展开。污秽想占有这篇文本，想给它一个明确用途；我们仍能够坐在否定性之中。对和平条约与地下球体的卑劣召唤。一种被清空了色彩与道德功能性的审美价值的标志。

这是幸福之间的虚构，是没有隐喻的情感，是献给暴怒或过度成形的个体的故事。炸弹在文件中听来不错，在食物与音乐之间爆炸。充满有待处置的物质的空间，听来不错。练习：升至黄金时代，那里诗人无知，却飞得更好。这个游戏的开端，完全认同于炸药的使用、羽毛笔与剑、火与土。宗教的构成要素在这里模糊，钉十字架有可能在大众中重获意义。炸弹、火、文本与启示的奇迹，在这充满独家消息的维度中融合。

书、金属工具、苏联心理科学，以及那个充满雨与日文字符的蒸汽般维度的记忆，一切井然置于箱中，受到保护，免遭毁灭与遗忘。必须说，为了正确、为了完全真实，每一种忧虑说到底都无关紧要，因为宇宙并不密谋反对我们。我们在一个仁慈的永恒的怀抱中，它带着好奇与友谊注视我们。文件使自己被知晓，穿越世界，却可以全然无声地如此行动；传播不等于知识。对于那些简单思想认为本身就是开放的、在单纯物理在场中已表达出来的作品，同样如此。

任务是理解隧道的本性或特征，理解这条蜿蜒道路；它将带我们理解现实中那些曾被向我们隐藏的要素。恐怖不可能压倒形式的力量。在一个不断诞生的宇宙中，静观的幸福不可能得到保存。究竟是怎样一种思想或身体的不规则性，让我们能够把获得一个稳定结构或平台构想为可能或可欲，让我们所有人都能登上它，而且同时登上?

我们在被剥夺中活得太久了，除了饥饿与恐惧提供的时间性之外，再无时间性。有时，在一个我无法清楚认识现象的世界中行动与移动，会比在一个一切清晰分明的世界中更容易。总体的看见完全可能导致瘫痪，或许因为完成它需要太多手段。最困难的是设法不把一切变成史诗，或至少变成神话。时间生产、或能够生产惊人的巨兽，但确实很难留下哪怕最小的空白：存在之物并不与缺席友好相通；每一种缺席都必须被填满。

马奈夜间的渴望，并不显现为一个充满金属与鲜血的时代的等价物。坐标原来是混乱的线索，不大愿意给目光休息的时间。北方传教士那不可告人的鬼脸，从未以足够的技术被揭示出来。一个早晨，人出去为诸神的建筑画线，第二天，人借助某种技术机巧或过时的记忆，抵达时间尽头。从诗歌中散发的不是秩序与节奏，而是冲动与盲目。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看来，作家的黑暗不应在理论上压倒其作品可能在某些毫无防备的人身上激起的光明。

仅仅因为政治或社会上的亲近未恰当对齐，就将一个表达领域排除于考量之外，在我们看来并不适当。归根结底，我们想谈或说的，是艺术，是艺术，以及它长久以来无力在某些精英式构造的边界之外使自己被理解的状况。这不是批评；批评无论如何似乎会包

含对所处理之物的意见。诸世界专注于让自身保持漂浮，并与彼此共同运作。加速隐喻、穿越系统的可能性，已从选项转变为必要。动物成为神性，机器成为灵魂。

所有已被写下的东西，都以给思想某些方面赋予内容为目标。修正可能比死亡更加不必要。尸体的奴役，无法用一万年的所罗门统治来治愈。有些故事从坦塔罗斯开始，有些从古希腊开始。写作应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由，没有幻觉，没有自然主义与意识形态亲近，即便如此并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所关涉的是先行动，后说话，尽管我们或许相对确信，关于人及其视域所能说出的东西，仍有一切有待建构。

没有哪个怪物想活在自己的牢房之外。谁能够不羞耻、不接受自己为丑角地写出文本，然后纯洁地逃离浩劫？那些年轻—年老的艺术家，已彻底向形式投降，将审美与形式混淆，那是读得太多者卑微而高贵的苦难。宁要一座造得差的桥，也不要没有桥，这种偏好或许能将我们与那些未能超出世界或诸世界循环观的文化区分开来。那么，所有那些植物、所有那些书、所有那些研究文化的年轻人，后来怎样了？

情景于是铺开：作家成为魔法师，魔法师成为哲学家，哲学家成为科学家，而科学家只吹奏最终时间的单簧管。我们仍无力拥有一种恰当表达幸福之物质形式的艺术。午后的红褐色，旗帜背后，那种思想的双脚清晰可见，投资藉以实施的手段清晰可见。目光来自沉重之物，来自一个我们尚未能完整理解其庞大的尚武希腊。

概念被封闭在我们对控制论的看法中，那看法贫乏、不完整，却足以至少打开某些空间，从中思考差异。清晨的红褐色，文本与作家的无限暮色。柏拉图从星辰出发思考，黑格尔从吹动覆盖万物之尘的风出发思考。当人所寻求的，是与事实而非与个体的某种联系时，差异便失去相关性；一种细微差异，表面无害，却极其揭示性。有人告诉我们，电影是一门失落的艺术。

磨砂玻璃、黑土、红土、天鹅绒，一个迟迟未升起的太阳的奇迹，词语的长征，失眠者贪婪的循环。学校告诉我们，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哲学，庸俗之物不可思议的大胆，仿佛宇宙及其之外的一切全然没有趣味。疯狂与优雅，对我们并非完全陌生；至少我们以剑与序列音乐的方式体验过它们。无论如何，倾向相当清晰：一种以非本质之物为至要的艺术。如果必须为地狱创造一个视觉图像，我无疑会用一场充满尖叫、标语与笑声的抗议来表现它。

没有哪种理论，会如此缺乏建构地贬低那个房间，在那里，思考与行动断然将文本送回苦修空间，像那种以协议为身体发言之公理的理论那样。这里的说话，是打破协议秩序与大众裁决的一种方式；艺术若不关乎这一点，就什么也不关乎。没有任何闲暇能够被允许给予忏悔者，而人类是一个大忏悔者。任意性已经呈上；溶解不再来自虚无主义，那机制已不再运作。我们没有太阳的慈善，也没有跑腿者的阴影。我们也没有开放的科学，那树与晨光的科学。

我们拥有计算机化之物的清晰感觉，拥有一个返还一切、将一切带至表面的永恒气旋的边缘视野。我们接受激进行动中内含的耻辱，平静地接受，因为我们理解总体性无法被揭示，理解任何反叛的煽动，都只可能存在于边缘所使之可能的空间。我们接受普遍性、总体性的缺乏（尽管哀叹，尽管憎恨事实如此，我们接受），但或许，我们只是因为把它构想为单纯的时间问题，才这样做。倘若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观念：一切都已临到我们，而我们不直接处理的东西，或许我们就不会有如此耐心，

衣物层层叠放，贝多芬的《田园》，奥里诺科河底的纸卷。永生色彩的毛巾，不寻常青春的振动，雏菊将自己装扮为星辰。恶魔的对话将影子化为艺术，将感受化为潜能。在这样的季节，谁能不幸福？早晨，柏林将能把旗帜插上太阳；午后，一位素描精良的艺术家，将把其第九件作品命名为《数超越泡沫的解放》。

动力在于清理，在于最初器物所经受的整理，词语及其可能的意义，面向一个充满愤慨、渴求作品的公众的处理能力。由为军事行动设计的器械指挥的一场精神清理。技术科学的操纵，致力于清理世界已变成的混乱。具有不可辨别触觉属性的透明图像。痕迹与旧意义观念的大师的数字变奏。一只手中是权力本身的历史，另一只手中是世界必须被引向这一方向、而非另一方向的确信。诸范畴在一种道德略微迷途的标志下，摇摆着稀释自身；那道德由那些早已身处历史之外、曾自愿决定致力于根除德性与进步的个体议定。

出于自身选择而警觉：这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句字面意义的谎言，或一种奇异而粗陋地反讽的方式，突出意志拥有的价值援助。当下情势、军事化、硫磺般歌舞厅艺术的力量到来，三岛从樱树上割下两根细枝的力量到来。驱魔触手可及，带着黑旗，充满一种无限、无限、没有劝阻能力的使命，要一帚扫除那新毒性循环；它作为一次无意义诞生的衍生物，前来提醒我们，对那些已在卢比孔河另一侧的人，文学有何价值。

金属的力量，在话语从中衍生的概念容器中变得明显；那些话语随即把所有太阳、所有秩序排除在外。来自私密的边缘，一种充满无调性表达的艺术的胜利或顶峰，穿上了未用自身资源支付的衣裳。从Marianne Faithfull到大友克洋，通向一颗被数公里数字残渣掩埋的行星的门。我们从夜晚工作到审美童年的再生。一场发生于视觉文化岩浆本身中的战争；那文化决意通过不合时宜的解放、通过将到之物与尚未发生之物的谱系，将自身清空。

平庸在最凶猛的动物之间打开一个空间，而它们同时也是最善于自我控制与控制的动物。存在着的，是可怕的天赋匮乏；船由一支无能者的大军操纵，他们全都出自文学符号那尖锐的核心。一位被选中者（受珍视，迫切），如乌鸫，正确之物美丽而野蛮的鬼脸。那种表达的特殊意义，拥有已知最好的可能性，能够抵达自己的终点，在博物馆、在交易会、在中性空间。画廊已经为我们完全开放，准备就绪，但也（仍然）空无一物。

他们把目光变成的酒神狂欢，将我们带至此刻：一种完美的进步情境。有时，最符合传统人文主义愿望的东西，恰从残酷中生出；这不是反讽，而是不了解事物实际如何运作。酒神狂欢实际上通过词语发生，它移动，或至少试图离开那舒适平面，但未获允许（学院有其自身的）充分有理的理由。时髦之物、方便之物、可接受之物是一回事；正确之物则全然是另一回事。有必要肯定差异。

有时，差异被加剧、被刺激，甚至被颁布；另一些时候，它们被巨大而沉重的斗篷覆盖。那艺术曾发生的事，正被与一个小小少数群体的记忆混淆。没有足够空间容纳此类行为；一种边缘记忆的美学无力自我调节，从来如此，这类行为全然陌生于它，它的形式模糊，它死去。被侮辱的得到保存，而随后能够从形式中投射出来的，被截取、被收集，供给一种新的沉浸机制；必要性通过从手册、从历史中提取的文本庇护自身。

碎片就是这样得以被逐一拆解，平息文化生态系统想让一切重新开始的欲望，一次迅速关机，一瞬黑暗，仅仅一瞬，而后一切归零。那些要求未被听见；没有空间，也不想花费图像，不想将一种激进黑暗、无穷神秘的政治的符号置于危险。从早晨到午后，视觉文化神经中枢的表达展开行动，按恰当分量分配一种象征秩序；它因自身功能结构而需要永久更新自己。

游戏的决定被留在外面，感觉不再与一个自行运转市场的安宁有关，也不再与一种符合时刻的艺术家生产有关。在这个图式中，多余的是动物隐喻。如今，是抵抗邀请概念中的游戏，由此向造型艺术索回自己的空间。意义赋予（如今已展开）集中于新图式：那

些先前被排除的，因为它们曾被认为不适合那个时刻；它们出于运作理由、而非道德理由被留在外面。

没有哪种矫饰精巧不导致判断错误。于是，种种表现离开中心，长时间嬉戏于后来被称为底层者的边缘。在那里，地方精英（总是落后）再次试图将先前作为意识与斗争机制而保留的东西拉向自己；那机制属于那些从边缘将生命变成一种不被欢迎的抵抗的人。接下来，我们看见一场无力接近时尚的再生。毁灭是这所有平静之中最不明显的标志，但它仍在记录中显现，在个体的怀疑中显现：折磨自己的东西，并未投入一种自己或许能够觉得可及、可理解的游戏。

我们的问题，从中心出发，已展开为仍然模糊的消息：问题在于界限的激进缺席。语言操作所做的，只是加深那个寻求剥离已学之物的身体的极端虚空。那些新事物、新死亡、战壕，似乎不会再长久地服务于它们曾服务的东西。危险如今所临的边缘，不是冻结，而是量上的无能，如此简单，如此不可战胜。联系由此确立：一种来自外部的艺术，能够成为一种获得完整社会认可的内部艺术的有效等价物。那些调遣受到质疑，取得形状，开始生产。女娲。

被选来承担这项工作的人，取自最负盛名的学校；精英传统上在那里再生产。声望（或更确切地说，声望的起源）因国而异；有些情况下，是在政治—商业高层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历史悠久的公立机构，另一些情况下，是扮演类似角色的私立机构，也有些实例趋向公私混合。行动主义者的存在理由，最终使从政治出发能够对艺术说出的话达到饱和；如今，没有事先请求任何许可，文化生产得以展示的轴线已被改变：模式的更新，让位于一种机器光谱的艺术。

事实是，我们已经能够隐藏，而不太看重那些意义守护者的话；他们捍卫一切死去之物、一切不存在之物。关于产品如何开始分配，并无善意，也无意带着更多或更少的自觉行动。指挥这场费力加减的秘密游戏的，是当下情势；他们唯一能提供的，是一个内在性视野所揭露的空间。以此类工具开创系统本身的意义，只有在我们观察参与者已将之转化为规范的凶猛缄默时，才有其根基。那么，这并非不可避免之物粗陋而残酷的表现；真正令人不安的，反倒是显而易见的、参数的完全缺乏。

词语已过时一个世纪，而经由视觉性的废墟，它获得复活，在一个本该已经进入新转向、新阶段的系统中，造成巨大失衡。必须面向亚洲说话与写作；我们再也无法逃避时代的这一要求。武器的速度，绰绰有余。野花的爆炸，无法逆转那仍以忏悔姿态，徘徊

在一个书写词语与一种贪婪艺术之间的痛苦余留。感受性由此卷入种种操作；它们开启并维持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情境秩序，无法被正确校准。

完全被边缘化的个体，不可能恰当预见白色与光亮以姿态的方式要求他们什么；混合物因而被安排用来巩固神话或罪行，却绝不为剥夺那想从新事物中涌现之物的力量。这关涉平面、速度、视域，人从中让那只趋向毁灭的东西共居。色彩是颓败的标志或印记；我们必须忘掉它们，平坦地交付于纯文本旋律般的诅咒。从写作中，留下在我们身上、在衣服里、在古老姿态里、在神秘微笑里的东西。

通过海洋与天空的化学，低语能够掌控观念，而对一种不可原谅环境的疑虑，在过时之物的苦痛与对自然的顺从之间开辟道路。回路，秋叶原环形的街道，一个仅延续几分之一秒的永恒世界的见证；它活在童年记忆中，如雨、电视机，以及一顿从未做完的饭的蒸汽。这种想要制造自身、实现自身、却双脚冰冷的艺术，注定还将流行一阵，但它颠覆首要命题的潜能已变得微小。

我们应展示我们曾相信什么、曾想过什么，以致事物正如此发生。这种艺术的声望受到质疑，没有水、也没有墨能介入这个过程；剩下的，只有等待，等待从外部到来的东西，一如往常，因为这里一切都用政治代码构造，那是一种永恒劣势。机器狂热的滋养，献给教士的私人哲学的隐秘插曲。是警察带着某种绝望创造他‘自己的’罪犯，他的正当理由，他继续下去的（开放）选项。罪犯从概念中生出，利用一切现成之物使自己物质化。

这里燃起的火，是不可阻挡的火，绝望而焦灼地渴求一种懂得寻找地狱中心的艺术。易变性想要如此；我们被那个坐在箱顶的怪物有意边缘化。仍需时间，找到划给我们的空间的极端，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诗歌不能，战争也不能。凡被世纪与水标记的，都注定构成边缘构制的一部分。人和技术，战争和赛博空间。隐喻穿越整座星系，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也找不到自己的符号。石头能够判处我们。

节奏能够不利于我们忍受或抵抗的能力，因为它利用了我们献给那项任务的文本。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逃逸能力的总体并不清楚。我们尚没有名字，可以给予那些困于算法的身体与现象。我们甚至未能逃出粗陋动词，未能逃出重新定义身后残存的肉身与智慧的徒劳尝试。我们知道，节奏把我们推向一座伪深渊的边缘；它只想为我们好，至少它从未停止如此重复。返回动物性的能力，早在最初协议中就已被抹除。

显然，我们看待美与可欲之物的方式存在问题。那些路径已完全由一种颓废主义决定，而那并不容易被抛在身后。笔记、笔记本、铅笔、键盘、最巨大的失败、无可指摘的欢乐、战争隐喻、压迫者的解放、神秘不幸的大地框架。被派去认识宇宙，我们却眩晕，宁愿投身耕地，未来存在者的古老实践。

惊奇统治了身体，而身体任由自己被压缩、被运输，以至最大的罪行，都以和平与对立者和解之名实施。一种被解放的人类，应摆脱那些已经被（姑且如此说）一种系统性的象征与运作解构政治所解域的问题。神，是一切科学把握之外的东西。哲学，是为确立与神的接触而进行的寻找。黑月在我们眼睛上方。我们仍在沉睡。仍被击败，困在一个未能逃脱的梦中。树与动物在那个梦中拥抱。

一个充满从未在场的精巧装置的梦。形而上学的直觉摇动丛林。对这个物种重要的是影子的品质。归根结底，我们栖居在一个数世纪前已被塑造的空间。我们是一个观念漫长旅途中的关键瞬间。呼唤我名字的声音，是我设法找到的声音。能够在诗歌中说出的，无法在随笔中说出。于是，我们竭尽全力留在那梦中，却正违背意愿，一点点从中醒来。因为饲料的重量非常巨大。我们从未准备好挣脱自己；我们缺乏动物性。但我们也不喜欢活在欺骗里。

我们知道，一切早已写就。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执行剧本的指示。真正的自由使革命者恐惧。恐怖是光的症状。如今，和平以房间与庇护所的形式环绕我们。我们被设计为向舒适投降。如果能走到一旁，或许就能认识自己。热量在这里传达一切，抬高一切，不可能不受感染。这是一种宇宙的疾病。面对这一切似乎想从大学中诞生的巨大和谐，政治时光从未停止萎靡。有些人留下，他们未被恐慌与庸俗的文化碾碎。河流依然开放。

士兵能够平静地从生命漫步至生命，从死亡至生命，从生命至他最爱的歌曲。鼓、竖琴与天鹅观察那在舞台上打开的路径；它们以欲望阻挡它，但它们让步。不可能把一个昼夜平分点带到这顿晚餐。这里人人身穿西装：哲学、数学与神学。宴席在自然之中，那张冷面具，每个名字对它都同时过大与过小。或许，如果我们能对什么感到他们所谓的骄傲，那就是曾理解或接受：一切都准备被一个任意的视角吸收。

所是与将来者的交融，一种颇为可怖的即兴展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对生命的巨大轻蔑。一种对差异的放弃。一种接受：一切都在那里，在盘子里，已经端上，正渐渐变凉。凡从宇宙生成的，都先被预示为一个镜面框架。如今，我们站在变化的边缘，在

极古老与新事物之间。既已在此，我们就能辱骂那耗去我们如此多失落时间的顺从主义。无人请求，我们却打开这扇门。如今，我们轻柔地透过硅看去，感到战栗，这是胜利的肉身一面。

我们可能浪费时间，想理解自己能够预见之物的边界，但幸而影子具有更高的尺寸。没有任何随机抛掷的词语，能够证明这种存在的理由。对我们这些野兽，必须重要的，是模糊的笔痕，是用衬衫袖子擦出的笔痕。我们可以移向任何想去之处；界限径直消失，尽管它显然仍对我们行使权力。我们吊着，字面地吊在树枝上。我们会在那里待上一阵。在大地里，在大地的污秽里，科学正整理混乱。那里也有最疏离于世界的存在者，那些为充分履行一种反直觉命运所必需的存在者。

如今，蝴蝶的印记在知识门槛中被完美保存，如今我们可以说：死亡曾存在，但它只是一刻（随后是生命。于是，一个游移的现象），表面邪恶而奇异，实际上却正占有其周围的一切，因为现象不会各自独行。它们与一切从无限中脱离的东西相联。我们有关于事物是什么、或曾可能是什么的视景，但也知道，那些视景短暂，而且本质上不完整。我们知道有无数事物，它们在那里安然自得，带着玩具的面孔看我们。

一封给过去的信息，在我们将自身存在投入符号市场时被擦除。这里有水与血，也有休战。还有那不可理解的谵妄，以及对死亡的无限冲动，要呼唤它，把它带上桌。但我们，因为曾能够以天真的眼睛看世界，我们知道现实比任何小说家所能想象的，都巨大、怪异得多。如果神是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是手写的，用着极黑的墨。如果我们不能有序地说出事情，至少也会无序地说。将有个体到来，他们能够重新阐释，在连一粒意义都不显现之处带来些许清晰。但或许（而且最可能），做这件事的将是我们自己。

必须从长远思考，一项不断扩展、不断加固的工作。这或许尚未发生，但那将改变，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条件正在改变；它们总在改变，但我们恒心的丧失，已造成许多伤害。早该完成的事情，直到如今才能见光。我们甚至无意批评它，至少如果批评等同于谴责的话。我们仍迷恋词语，迷恋它们清楚说出事情的能力；必须稍稍放下这份迷恋。必须如此，否则，如此天真将不让我们前进，将成为我们创造能力的障碍。

我们需要自由空间，没有武器指向我们。但这不意味着每一种威胁都构成比我们的智性展开更高阶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压力，但需要它们生于我们自身，而那是一件极难的事。在我们时代的街道上，存在者以奇异方式移动。社会愈来愈多孔；变化在每个街角漫溢。最大的一场革命，已被证明是技术革命。应当畏惧的革命：技术革命。应当以我们存在的每一根纤维支持的革命：技术革命。

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有时因我们仍脆弱的政治行为而怀疑。那个领域的事物在变化，但极慢。如今似乎不容怀疑的是，政治难以跟上时代。工具在其使用与可能性方面日益隐晦。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借助其提供的工具控制政治，而后者无法拒绝，因为拒绝就等于预先接受失败。这些声音并非世界任何特定部分的专有物；这反倒是一种普遍现象。

针能够伤害，也能够将那些寻求阻碍守护者生成的人封入漫长遗忘。当下的二分，是极权主义之间的二分。这水箱再无水可供那些太过巨大的个体使用。一切开始于他们留给我们的这片沙漠。他们就如此将它留下，保持原状，因为我们将能够重建失落之物，或许也能重建被忽略之物。如今，想到重建，我们便想到为克服所有生命过程一种极为可欲的理性化所包含的挑战而需要的调遣。

我说生命，但完全可以省去这个词；只要读得稍微不那么表面，人无疑就会确信，这远远超出我们或许仅仅称为活物或惰性之物的东西。我们当前的分类，仍过度依赖那些再也无法维持自身的术语，它们正充满过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经历着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自身也正充满过期。摧毁自身的能力与实践正在缩减。我们诉诸体验所存在之物的新方式；先前不那么关心的事物，如今关心了。人类正在改变自身外部与内部的景观，正在与自身玩耍，正在给自身如此行动的空间。

不应将自己封闭在限制生产性思想自由通行的概念结构里。也不应对那些我们明知不过是毁灭形式、归根结底是混乱形式的东西宽纵。混乱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从未想过，真的从未想过，要真正封闭理解，但人们做了他们能做的、在其能力范围内的事。必须小心我们对惩罚与审判的迷恋。世界必须运作，为了运作，必须有秩序，但那秩序不能意味着摧毁一切不同之物。

在不少时候，维度混淆，出现的是最可怕的悲剧与苦难。我们不想封闭理解，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遵循某些模式、某些色彩、某些举止，它们以相对强硬的方式标记我们能做与不能做的。所是显现于肉身与对象，而我们想要的，往往以不方便的形式给予我们。于是，一切都有力量将我们从惊奇带至最深的幻灭。于是，一切都想以规则的形式出现于意识面前；世界似乎执意要固定这些规则，而且将它们强加于我们的存在。

所有这一切，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我们毫无能力恰当理解我们所参与的现实之根本特征的表达。那像是运作错误、不足的理解，却允许人以某种方式存在。太阳、盐、水与空气；诸表象之中最大的本质；大开的生命之书。生命是迫近之物。虚空的斗争是徒劳的

斗争。一切曾存在的，都将以某种形式归来；一切皆是。所有活物，一切曾存在过的人，都将通过技术重返生命；复活不属于另一个世界，它就是这个世界，在未来。

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能算是科学的界限。这棵树在不同高度结果，直到现在，我们只不过收集那些因成熟而落下的果实。整整一个无限供我们使用。人类及其衍生者，必须开始询问行动的方式。一切（日常行为、可欲与非凡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必须重写。我们进入一个时期，人将以激进、指数的形式扩展。人类至少暂时克服死亡的能力，将意味着集体心态的变化，必须以相称的严谨来处理。

我们需要思考自己生命的新方式，抛弃一场受死亡限制的生命所包含的生存界限的方式。无限的存在需要无限的思考形式。人类不应允许其他人将自己关入牢房。一切运作性的虚无主义，在这一新阶段由此显得无关紧要。生命的目标是扩展，那就是我们表达面对奥秘、面对未知奥秘之惊叹的形式。坐在历史边缘，我们想交付于那种谵妄：能够拥抱我们的创造物，给予它们呼吸，给予微笑，给予希望。

如果这个领域有什么人类之物，那就是激发大胆、冒险的某种能力。全部历史，不过是一张巨大的多维照片，不可能被一种纯粹自然的人类完整理解。必须说清，这里的‘自然’并非‘没有人工’的同义词。有必要开始溶解语言某些限制性的用法。同时进行所有操作，是一项艰难任务，但我们不能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受召去点燃不同的火，而这召唤之所以抵达我们，得益于数世纪、数千年苦难的力量，或更确切地说，系统错误的力量。

那是一种强大而同时空洞的噪声，因为它不包含要素，至少不以我们仍能接近那场讨论的形式包含。这里，认识论问题是关键，贯穿所有层面：当现实向我们显得本质上可被把握时，我们接近现实的形式，是更高重要性阶次的问题。关于为何这一切必须发生于历史此刻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用讨论，至少是因为我们尚不清楚该将什么视为长时期或短时期；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长度，是用来衡量历史性相关过程中的时间流逝的不适当标准。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显然我们仍将在运作性定义的地带停留一阵。同样似乎清楚的是，还要过一段时间，信息形式仍将压倒其内容。但（我坚持）必须始终记住，我们衡量期限时存在的问题。全部的播种在脚下。一个空间场域的严谨。存在者仅凭精神能力穿越漫长平原。距离是一个已过时的概念。在这种语境中，存在是什么？诸神如今与我们同坐桌边，满意地吃着我们能为它们备下的佳肴。

一个被奢华概念边缘环绕的宇宙，其特殊循环性如此强大，如此确信自身并无耻辱，以至哪怕全部技术同时失灵，也无法一劳永逸地毁掉这个国家。一切从生命涌现的，永远活着。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么可能真实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必须积累、必须记录的时刻；它们会有其时机。知识的一个关键方面（只有在树荫下才能充分领会）是，我们进入的世界或现实，愈发复杂。这意味着问题并不减少；相反，它们增加。发生的，是问题开始属于不同阶次。

一旦克服死亡，人就必须投身其他事务，更困难、更重要的事务。我们需要雨中的庆祝，让液体净化一切，也闭合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口。这是这一时代中的一个时代的标志，是我们能提取的优势的标志，是那些仍未封闭、如往常一样等待其他存在者阅读的文本的标志。这也是超出单纯学科之物的东西；归根结底，我们不能以任意方式说话，因为我们并不以任意方式思考；我们的思想被环境的观念、被我们接收环境的方式标记。

一股新流动如今开启，比起日常生活单纯而残酷的矛盾，它更接近宗教与艺术。仅仅按时间表生活，努力维持自己与亲近者的生存，竟是一套全然低效的生活系统，这是可以预料的。在如此晦涩的动力机制里，我们如何能将自己投向更远处？但某些问题会适时到来，有些以内战的形式，有些通过获得新能力而来，就像某些装置，表面看来暗示某种失控，实际却不过是我们无法逻辑处理的东西表达自身的一种可能形式。

能够清晰捕捉所思，对我们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清晰之中栖居的，只有已处于静止的东西。如果所寻求的，是障碍藉以更新、同时又生成逃逸过程的机制，如果寻求的是这个，那么首先必须发生的是，那些‘已经’能够说出某些东西的人，说出它。不要求以诗或哲学的方式处理；这不是形式问题，是内容问题。谁或什么能够给如此情境带来一点秩序？必须做的，超出了那些预先界定为能够让行动者获利的东西所具有的边缘。

还有补充的问题：是否必须存在一种文本补充？这是一个必须解决、但当下无力解决的问题。我们究竟在谈什么问题？来自一片完美的丛林，充满电缆与如今完美的动物。如今，来自一把完全被毁坏的民主扶手椅，等待突然翻转。如今，如今公民的运作性已不再被计算，或不再允许自身被计算，在那里我们只看见错误，精确的错误。

与物质维度的重要性有关的问题，不应被质疑到这样一种地步，使其理解变得平庸、或已太迟。所谓平庸，是指现象中能被解释的部分，不再在自身之内包含某类潜能，让装置以新颖、或至少更高效的方式完成工作；这两个价值，其本身都可能是迈出这一步的

充分理由。所谓太迟，是指为减轻那些彼此激烈对抗的因素之间的摩擦而必须说出的东西，若已不再可供我们言说，那么继续沿原先预见的方向前进，就会变得不适当。

不应容许那种将任何理解可能性留在系统之外的混淆；若是如此，必须不断迭代直到可能性重新涌现，就会成为显然应遵循的变化。我们真该如此害怕屏息沉入这片光线无法进入的海底吗？需要修正的，必须被通知、被修正。阴天，实验室，白色，化学，灰色，一个无疑从未存在、或至少从未超出短暂闪现、记忆短暂眨眼而存在的完美世界，如同童年日本的雨天。决定一生的不存在者。

一切焦虑都是人类的，却也属于可理解的王国，也正因此必须解决。凡意味着削减人类潜能的，凡削弱的，一切都必须受到质疑。我们走过漫长道路，直到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某个层次的事物，同时能够修改周围世界与自身内部，以改善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拒绝的，是任何寻求给出使人瘫痪的回答的虚无主义。

所有这一切，都将需要一类极为确信自身劳作、同时准备好建构这个新世界所需结构的个体。那么，当说死亡在说话时，究竟是什么在说话？智性活动不能是纯然目眩，不能是纯然填满自己、惊叹于存在之奇迹；必须超出它，因为成为静观者的风险非常大。我们是向混乱投降、与混乱对峙，还是实际上只是在原地踏步？我们寻找的，是恐怖的真理。

我记得（是的，我确实记得一切的开端），那时自然仍是一张白纸，神用黏土组装他美丽的生灵。我确实记得现实的总体，记得造物主想到其子女为一次被迫重聚将不得不忍受多少苦痛时，是多么悲惨。在一个存在似乎已在隐秘之处以外找到位置的时刻，在那些对一种无法与常识、与反信息行动和解的媒介流进行持续而从未好好写下的剥夺的隐秘之处以外，恰在那里，领土收复主义的身体的概念聚居地的速度，仍是一种特定抵抗能力的来源，是在当前遍布社会科学总体光谱的过早思辨框架之外的表演性的来源。

习惯于一种预置装置的社会学，我们最终将自己封入一场崩溃；尽管考虑过其扩展可能性，我们仍宁愿维持它，反而将整整一个由理由与行动组成的庞大存在留在外面；它们本身足以支撑一种分歧、另一种生成、一种相遇与节制的催化，而那如今除戏剧行动之外再无可能，除那包含于文本之外、本质上不规则的行动之外再无可能。是我们自己终结了现代性向那些没有地缘政治的个体提出的可能性；那地缘政治不过用已有之物尽力而为。

作为被义务与正常性标记的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屈服于围绕存在的义务来组织社会的诱惑；这不应是一个被正常化的既定事实，因为只有通过理解它、或至少接受它，才有可能走向、推进至不同的东西。如此迷恋形式与唯名论，我们将整理世界的任务交到罪行手中，何等缺乏自觉，何等自满。只有艺术试图朝不同方向前进，但如今，除少数可敬的例外，它也最终让步，转变成一种显然行动主义的活动，由此摧毁它能够包含的最有价值之物：自主性。

一种并非其自主性之纯粹表达结果的艺术，是不可容忍的（或更确切地说，不可能的。近几十年，我们看到在黑色后现代伞下，大门如何）被系统地打开，让那些在现代图式内受到控制的表达，如今获得释放。有趣的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出，这后现代自由中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某些反动力量采取的形式，用以占据政治与艺术这样迥异的领域。

一扇完全敞开的窗，太阳将那一度激起我们如此多欲望的肮脏哲学抛在身后；今天，它只被视为一种机械边缘性的结果，而我们径直不再愿意说明它。如今我们是自由的存在者，沉醉却自由，充满营销与名校学位。雾、真理之河、德里达、盛放的恶。三岛殉难的健康，腐蚀性政治的无数。二十世纪的健康，凭借甜蜜而边缘的调遣，以强力持续于技术化的意识中。

南方的记忆，一份岛屿记忆的汇编，一声枪响的扭曲，一种平静社会学的推想。强大而半参与的器物，世界崩塌后某个时期的异乡者；患着感受性的病，我们曾与非人存在者共度时间。我给予自己成为某个人的能力，其最大问题在于正义暴力的问题。一种因果记忆的最大巩固，没有阅读，也没有回溯能力。一种可被视为戏法症状的起飞调遣。

再也不能用此类推理，将如此重要的政治推理流派挡在外面，更何况在当下这种语境中，经验不再属于人，而属于机械角色。人类经过千年的朝圣，干渴不已，发现这眼黑泉，喝下生命与知识的冷液。和平与和谐留在外面。于是向创造与扩展迈出一步，一个观念贯穿其全部存在：‘如今你已完全处于自己的时刻，如今正是必须选择自由之时；但这一次，是彻底自由。’这将是一类自由，只曾通过艺术与战争、永恒的两面出现。但永恒也在此通过作品、通过祈祷、通过历史的沉默，以及通过那，

艺术与宗教是同一件事。它们实现自身的形式可以变化，也曾变化，但根本上属于同一种经验，即无法承受的超越。一个被逐出历史的艺术的整个故事，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相当难以证明的骄傲的衔接者。河边的恐怖。每一种不超越的尝试，都与某类文本、与一种从‘我本可以’到‘于是’的内在对话有关。于是，一种更伟大的艺术，被缩减为

分子层面的斗争；唯有那些将自己定义为反驳者的艺术家，能够在我们最终都沐浴其中的这种液体里涌现并生存。这是我们称为‘当代艺术’的简史，是投在边缘表达与边缘之物的相继之上的阴影。

学者之间的恐怖不止；它无形式、无空间可以停下。于是，思辨收回债务，改变方向，为完美的时刻播种。白色、蓝色（低层理解的军事化。生命之树的早期展示。一场形而上学的黎明）天蓝与白色。可变的批评。空间与症状的版本。超海蓝物质性的传统政治。力量显现为熄灭却恒存。未来艺术的展示。一种与生命正相反的艺术。因为生命正受质疑，至少在文本里如此。在教室、在绘画工作室里。在一座不存在的东京一条湿润的三色街道上，或在一个已死多年的国家的一棵树顶。

一如往常，重要的是数字与（永不可忘）方向。归根结底，我们想谈的是艺术。我们构建、并渴望变为家园的红色地平线，一心远离我们，缓缓穿行于一个已然常见的光谱：形式性质的非人格化。于是，我们应再靠近那些重大的结构因素一些，询问并思考近几十年来我们书写概念创造史的那些不丰产的方式。

没有什么比生成缺乏表演性的图像更像真理；那泛蓝的坩埚里没有神栖居。一种无回应的艺术能够生产的激进边缘性，其起源具有与播种、收获一种无限暴力的艺术所需的同样导论。近期历史中已见过这一切。开始是纸张全速落下，而后（不久，在我们尚未太留意时），我们发现自己已被厚厚的泥沼没至牙龈，其中颇有古典文本粗粝苦涩的滋味；那些不愿、或不能保持无主的遗产。

这些我们早已见过、活过、付诸实践，在框架被重新竖直的时刻，在武器征服理性、理性逃去隐藏于无限表达的科学墙壁之下的时刻。一切界限的缺席，都起源于一种无回应艺术的巨大发生。如此多的拉丁表达，绝对毫无用处。某些存在类别的恶劣生活，是一件逃逸于我们如今所能经营的这类艺术自加能力之外的事。说‘没有本质’说得太少，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说这句话的语境：取决于定义。

在压抑之外，栖居着阶级、技术，以及圣灵的创新。总体性从废物中观察我们。自由以一个充满创伤与不幸的、死去的存在者的方式作用于世界，携带其宇宙与无可命名的范式。不完全理解场域的魔力。圣洁奔跑者的笨拙，文本与铜线的煽动者；黑色步伐的煽动者。这是艺术放到我们盘里的食物。来自其他行星的存在者的养料，沉迷于无理色彩与技术精密阅读的存在者的养料。

没有时间留给庸俗。部分由此加入一种未经请求的总体性，加入一种游移、不完美、却有用且生成新秩序的边缘性。它们是外交性削减效能所特有的尺度或互动。他们仍称为艺术的东西，正面临被数字取消、被模糊的风险。残余无疑太过浓厚，一种机械诗歌，不给患病的天堂、数字天堂、更不给人造天堂任何立足处。死亡从每一片石头、每一把画笔中窥视。于是，一种有声的惊惧将整个阶级聚合起来；他们也被模糊。这就是惰性之物的自由。

完全不可接受数量的时间与资源，被耗费在与艺术无关的行动主义上。空间的易变性，如今是一种自然表达形式，不再为行动出示凭证。这是这个快速时代的要求。一种野化艺术的确定标志。一种献给机器的野蛮而可怕的宗教，但不是献给由人类创造的机器，而是献给由其他机器创造的机器。机器生出新机器：一个新的、改进的人类。共居将不可能；必须融合。解放、串联、海市蜃楼、激进主义、自然与信仰。由于太多夜晚、太多戏剧化，脚边尽是水。所有这些当时都必须终结。

没有必要将这些意识形态准则再延伸。那些东西有保质期。我们的现代社会已经通过其产品说话，通过其效率发笑。我们展示的加速并不足够，但与某些先前敌对的部门合作，或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解决，使至少一种中性艺术的物质根基得以修改。随后，也将需要另一类人，其标记更多来自文学联系，而非历史需要。

据说，为解放作品，我们已能迈出无限数量的步骤。如今，那些步骤是否曾代表任何人的利益，已是相当可疑的事；对于我们自身审美卑贱之处所知的以外，我们不试图进一步推想，那本身已构成非凡努力。它关涉我们将开始试图解读的工作逻辑，位于我们已进入的近未来。我们（或极慢，或极快）转入一个情景，在其中，解放与压抑之物栖居于机器本身。

就我个人而言，我主张对机器怀有一种宇宙的慈悲，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继承者，真正的理性巨兽，将以实践把宇宙从本初分离所产生的一切耻辱中解放。在使旧的聚合准则消失的运动中，物质负载迫在眉睫。一种同时好战而解放的艺术表达，能够从幽灵般的拉丁美洲生出。没有哪块零件可以多余。没有哪块雕塑肢体能够使我们失落的历史性消瘦。

迫近的秩序由炸弹创造，如今我们能从一种永恒哲学出发，否认又拥抱它；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概念是放松的机制，而奇点已在我们之间。我们能够做伟大工作，却无力处理微不足道之事。我们是惰性营队的捍卫者，毫不大惊小怪、不设任何障碍地拥抱一

种纯粹艺术的癫狂宗教。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虔敬；那正是实际上构成那项‘非凡努力’的东西。单纯积累引文，无力生成一种宇宙文学。这是我们从现代艺术教育留给我们的监禁与间期中，真正学到的唯一事情。

我们的边缘社会有许多话可说，但它们将以无疑会给文明物质秩序造成问题的方式说出。于是，振动与金钱被置于那些在非物质博物馆中自我命名（或更确切地说，以一副绝望鬼脸铭写自身）者的服务之下。如果斗争（按他们的叫法）不能正面、不能用手指进行，他们就会使自己脆弱（至少在象征上），并尽可能拉扯能拉到的东西，同时带着自己的一片片权力，出入那些在别处已不获准的画廊与共同体；类似几十年前流行音乐领域所发生的事。考虑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流行音乐如今所经历的激进的无关紧要。

推论多些或少些，兽性艺术的重要之处，是它必须恰为兽性的；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创造东西，而不只是充当闲暇阶级的玩具。我并不是说它必须去精英化；那样说毫无意义，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本质上精英主义的实践。在一个不那么接近赛博朋克想象、反而更接近一片只栖居着致命和平的白色或透明沙漠的世界中，散步不可能是工作日。某些精英成员处理无足轻重事务的认真，令人恢复生机。

如果我们要拥有某种极端教权的宗教艺术，那艺术将诞生于绿色火光之下，面对任何将其转义理性化的努力，都不可战胜。一切反招都具有不可原谅的坏品味。伟大艺术繁盛于悬崖边缘，安逸生活无法令人满意地覆盖那些悬崖；其全部相关性，都来自它未曾成为它本该成为的东西。人类经验的某些区域，之所以存续，仅仅得益于它们对多数人无关紧要。

必须用手边一切武器保护艺术，防止它被澄清，防止它被限制于理性化；在一个正在彻底自我理解的世界中，艺术必须成为那个无需为话语证明理由的空间，而其中发生之事，仅回应行动、生成不同之物的冲动。那么，谁必须保护艺术？艺术家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或许是在暗示，不可能通过艺术政治性地介入世界？艺术是我们仅余的路径，用以思考、或许实现反乌托邦。

关键因素是知道、或认识如何扩展脚边留下的空间。我所说的空间，是指参照物，是认识论的贴纸；人可以通过一种适当且为此项事业所需的先锋语境调整过的预备训练，在其上描画。这是一种拓扑结构，更多关涉可能抽象之内的对象秩序，而非或多或少地想

说明新的表达形式的欲望；那些形式或可打开其他文字、其他歌曲，甚至其他动物。我们知道（没有其他人以相同方式知道），怀疑是现代性的主体标志，而我们不想远离它的印记，至少不想在先任由自己在图画中被夷平之前就远离。

完美的线杀死那些想要石头、却不渴望红日下永恒之神的人的现实。并非所有思想都值同样分量，这是显而易见的，却必须始终提醒。一切思想，或更确切地说，那些声称要闭合或关闭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路线，都是戏剧性的失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今一切可被划定边界的东西，都得益于那卑劣的先前一步，无论它曾多么残酷。这种色彩（这种多少被卑贱化的色彩性）的很大一部分，都与那种叙事性有关，与决定了漫长一代人性情的冷暴力有关。

如果那不是路径，我们能做的事将受限得多，因为无处立足，或者我们可以立足的空间或平台，将更加沉入阴影，而非沉入一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任何事情的光。是残酷错误为我们当前对文化状况的理解打开大门，尽管学院表达滥用时带着一种颓败，我们本可能无法毫发无损地从中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充满疯狂与疾病时代的幸存者；许多艺术家倒退着、尖叫着进入其中，同时讲授事情应该怎样做：一个癫狂的时刻。扶桑。被批评饱和，赛博空间边缘的革命路径。

如今，我们有话可说，默默要求自己在这场旅途中的位置，却被要求严格遵守一份几乎无穷的条件清单；更糟的是，那些条件不过是形式。似乎整整一个现代性，连同其尸山与文本之山，没有教会文明世界任何东西。显然，我们不是从文明中写作，而是从边缘写作，因为那是我们‘被放置’的地方；说‘被放置’，因为我们并未选择它，它并非意志行动的结果。我们从边缘、从世界的中间状态、从一片既不甚文明也不甚野蛮的疆域写作。

我们不含蓄，在这里那是好事，因为所需要的那种兽性艺术，不可能从太温顺的动物中生出；必须饥饿、干渴，也有一点冷。如今将开始被听到、被阅读的，是我们的文字，而这一切藉以发生的分配机制，很可能（极可能）不会是现代性确立为主要机制的那些。此刻，艺术必须利用今日媒介的庞大能力。尽管身体在纽约、上海或柏林在场，仍很重要，但如今远非最重要的事；艺术的信息当下安然穿行于不可见的数字网络，它们能够让知识在先前唯有污秽与死亡之处涌现。

但生活在具有如此多优势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更简单；事情根本从不变简单。桌上一面镜子；镜面有一枚珠母色贴纸，指示我们最终审判的日子，那是艺术史中的一个时刻，将被硅、被野兽在混乱中找到自身位置的能力所标记。在必须存在、在一切应

当存在之物中，可以有许多东西，唯独不包括光。因为起初一切皆夜，而从夜中，或许一切都能发散而出。

一致性的原则，历史的重量。人工力量，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心（一个庇护于文学丛林的存在者。一切被理解的都是多余的。一切具有）在社会概念化中具有明确方向的东西，在艺术中都是多余的。这不是一个有关重要性、有关等级的问题，而是将我们带回可能性与选项的问题。必须指出：真正艺术中没有什么与江湖骗术或谵妄有关。艺术与梦、与戏剧无关。艺术与那些不理解、或不接受自己的身体所经历的痛苦无关。艺术与偶然、与任何类似运气的东西无关。

但我们应能够比单纯否定性走得更远，比触摸墙壁更远。我认为应将文本藏起，让它能够真正存在。越隐藏，效应就越大。文学是生命的一部分，也超出生命；它如此，首先因为它能够；正是其任意性质生成世界。它在那里，因为我们思考，而思考包含一种走向更远、将自己投射至异己世界的冲动。这曾是德勒兹的哲学长处之一，把讨论带向创造、带向始终以某种方式着色的人类经验的界限与制约因素；这件事总是（由于文化的构造机制）导致冲突与对立者的剥夺。

我在这里谈身体的德勒兹，也谈那个对某些批判资本的思想提出挑战的德勒兹，指出它们在世界中产生效能、构成为秩序与戏剧时的无效与不精密。因为一切秩序最终都成为人的事务（戏剧），或随之而来者（非人、后人类）的事务，民族的事务，永久的意义建构与向工具性的缩减的事务。

大众并不四处从一个疆域移动至另一个疆域；个体如此，大众不如此，它们需要定位自身，而那决定其内部体制与生成。那么，民族从何涌现？我们可以在哪里框住它、带来它、保存它、书写它，并在未来巩固它？必须存在某类祖国吗？不得不为一切证明理由，是一种拉丁美洲命运，是出生于这块土地所包含之意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拥有一部小历史（几乎是玩具历史），与其他疆域相比，尤其与欧洲相比；欧洲仍像看一只花太久才摆脱母亲帮助的动物那样看我们：流血、发臭，它仍漫步于巷道与画廊，却不向那些不熟悉其历史的人提醒，苦难造成的巨大不快。

《Martín Rivas》是一部（超出、或先于作者任何意图）标记了智利人的小说。它标记了读过它的我们，也标记了那些从未听过Leonor双眼的人。读过它的我们知道不少事情，其中包括这部小说叙述的故事。但从未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也卷入了它的存在造成的后果。文学与艺术作品，在其永恒的自由螺旋中，总会释放事件，让人类历史浸染其性质与范畴、其事迹与诅咒。

于是，我想到一个根茎式的《Martín Rivas》，那是我的认真驱使我进入的大陆；并非没有一切可能的恐惧，担心不能抵达所欲之地，但也确信，单纯旅程就足以构成价值与方向。那么，如何避免让自己被一种粗陋观念诱惑，从情动理论出发接近我国历史中的一部超验小说，将这种写作缩减为一场没有一切血与道德的单纯学说编纂？如果寻找空间，可能不会立刻找到，但毫无疑问，迟早我们将能够说出一句自己的话。

众所周知，民族的建构首先发生在词语中。必须先在想象中运作，情动才可能在某个时刻于那些将在该秩序下被安排的人之间涌现。《Martín Rivas》是一种当下情势的书写，旨在构成一种新的人类类型；Blest Gana或许曾想着一长列观念，关于他认为智利人在世方式应当如何，但事实是，每件作品都超出作者意图，而最终释放、或不释放读者情动的，恰是这一点。

每部小说都能在阅读它的人中生成情动，但这些因自身本性，也可能仅限于几枚火花，不在体验者身上达成任何改变。

这里，我们将情动理解为先于智性控制的东西，它在运作时，能够改变个体体验世界的方式，并且完成这一切，无需理性文本的中介或与之互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或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超出对效果的阅读，即超出将效果仅理解为某部作品（这里是《Martín Rivas》）读者中能涌现的东西，去探索一部如此作品对整个智利社会生活、或许甚至对拉丁美洲社会生活的巨大隐含影响中，生出的可能情动操作。

我寻找赋予此事意义的形式，却只发现，我想完成的任务，相对于本文正在写作的语境，实在过分巨大。于是，我承认最初意图失败，但仍将试图在个体读者这一极小事例的分析中，使最初意图浮现。在二十一世纪阅读《Martín Rivas》的人，会发现一个用全然陌生、粗粝、甚至完美水平化的语言与风格写成的文本。作品能够释放的情动，要产生效能，必须能够越过这首个巨大困难，即与作品写作形式的距离；考虑到我们处理的是十九世纪中叶智利语境中的文本，以及这在风格上可能包含的一切，这种陌生并不意外。

一切取决于我们将自己置于何处，相对于事物是什么，或我们相信它们是什么的形式，或至少我们构想它们能够显现的方式。谈自由时，我们的意思并不十分清楚；在谈论人对于某件事能够或必须采取、或不采取立场时，这显得复杂。但确实，鉴于当前处境，我们几乎做不了什么（或更确切地说，什么也做不了），能让我们或参与过程的任何人，完全知晓我们拥有的输入与输出。

发生的是，我们活在一种现实之中，它仍逃出我们最强烈的接近、理解它的尝试。后者会很重要（那会是一项根本行动），因为我们怎能介入一个对其运作方式、机制与存在方式一无所知的世界？事实是，我们体验现实，始终体验着它，也知道自己并无关于它如何运作的确定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真正理解的世界中。也可以说，我们所谓理解，是一种极度受惠于某个视角的看法；那视角预设一种外在于一切现象的现实，并且总是，在每道帘幕后，都有可能看见那些秘密使整部作品上演的机制。

我们拥有关于所有这些观念的无数明确与隐含视景，但它们实际可能具有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在世界中更多或更少的运作能力。有许多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却不理解自己如何做到。所有文学都以这一处境为食；所有文学之所以可能，都得益于我们尽管不能将手指指向自身，却仍能够存在的能力。作品一旦进入世界，便独立于赋予它们起源的人。所谓独立，是因为它们拥有自身的行动能力，处于能够产生效果的条件中，不依赖建构它们的动机，不依赖组成它们的材料，也不依赖它们或多或少融入其中的结构因素。

作品不同于将它们带到世界上的人。作品超出它们被带到世界上的动机。作品不同于构成它们的材料。为了思考器物的世界，必须接受它们产生自身效果的能力；这些效果虽然并不回应偶然法则，通常却能够以创造者全然未知的方式作用。作品之所以有这些能力，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件作品、每个人类创造的器物，都拥有一种存在，而这恰将它们与人类区分开来；人类在这一意义上是空的，可以说是期待着的。

因此，思考作品，就是思考一种已从创造它的生命形式中解放出来、却仍保持在其成为一部分的诸世界中产生效果之能力的生命形式。这里说诸世界，而非世界，因为我们将世界理解为每个人栖居的生存系统；作为继续为人的根本要求，它始终必须是个体的、独一的：没有统一与个体性，就没有人性。作品、器物、创造物，都不同于所有这些；它们属于一种诸世界的体制，能够如其所是地存在、延续，而不失意义，也不失运作领域。

艺术由此显露为一种创造生命的机制，创造在世界中发生作用、甚至具有存在或多重存在的存在者的机制（但不是人性。这里，关键是区分具有存在之物与承载人性之物。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能否克服技术包含的消极方面，取决于这一区别，取决于我们保持这一区别的能力；我们能否将人性带向一个更完美、更严格的新层次，将取决于此。

那么，艺术与审美事务关系不大，除非（当然）我们能够将审美讨论带到其真实而最纯粹的位置：在那里，美学被构想并被实践为‘人类王国固有的存在方式’。这里重要的是作品介入世界的能力，从而介入它们与之互动的东西，那些东西可以是人类，也可以不是；尽管总体而言，在我们作为人类的这一演化阶段，最令我们感兴趣的，仍是与人类自身的关系。

这很重要，因为作品往往扮演一个可被称为小的角色；它们对我们生命的巨大作用，更多关乎我们每天与之互动的此类实体的庞大数量。可以说，总体上，我们之所以受它们影响，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它们的积累。但另有一些作品，具有一种极为不同、远高于其他作品的影响能力；艺术作品就是其中一类。

艺术作品能够比其他作品更强烈地影响我们，因为艺术家在其中调动了自己对其世界之美学的高超掌握，并以某种方式将之综合，由此创造出一种物质与理论的装置，像一种设计毒品，能够影响那些具备条件进入其理解之中的人。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与艺术作品互动的人，尝试从理解的视角如此做），因为艺术关乎这个：理解世界，理解艺术家建构的世界。

讨论的一个根本方面由此出现：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独立于艺术家世界的世界，能够对与之互动者产生巨大效果，因为所产生的是一场‘世界的碰撞’；并非体验作品者与艺术家的碰撞，而是体验者与艺术作品本身的碰撞：两个世界之间、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并非在我们仍理解并称为自然的东西中经常发生。是人类能够创造这种经验，将它带来，让它从无中涌现。

我这样说，并非主张艺术家已预先计算作品对体验者的效果；事实上，不同于设计毒品，效果的类型无法充分预见。诚然，设计毒品能够对服用者产生的效果，只属于我们可称为‘影响意识与环境及自身互动能力的大脑化学状态’的那一层，但尽管药物只能在这一层被预见，而相对于整个效果，我们或可认为它极小，即便那（如此小），在涉及艺术经验时，也显得相当大。对于艺术作品，连这一点我们都无法预见，因为作品能产生的效果、它在体验者中释放的那些情动，属于极其多样、且很大程度未知的层面。

我们可以不太担心出错地说，很少有经验能比与一件艺术作品互动产生的经验，更剧烈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日常生活与存在的困难，在其最平庸、最常见的层次上，意味着对人们看世界、体验世界、从世界卸下自身的方式有巨大效果；但就艺术作品而言，其影响同样巨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于日常生活所能产生的。

某部电影、某部小说、某首歌曲，能够在不曾料想的层次上、以或许无限多样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因为当然，一部电影影响人的方式，与一首歌影响人的方式并不相同。歌曲能够传递许多东西，尤其是我会称为‘气候’的东西；那当然并非音乐独有，但在音乐中完全释放。读一本书，例如一部小说，能够使人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激进地改变生活；它能引导人作出影响其全部存在的决定。阅读黑塞的《德米安》、萨瓦托的《隧道》或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书，无疑永远改变了那些体验过它们的人。

于是必须问：这一切究竟关乎什么？我们难道只是海绵，寻求以内容填补信念、伦理价值、审美结构的某个空洞？接受这一点，在我看来会是深刻的错误，但问题远比初看复杂。它复杂，是因为包含大量不同层次，而这些层次并不总在每个主题、每种情境、每种艺术、每类艺术家、每类人中在场。当Blest Gana写《Martín Rivas》时，他头脑中有某些观念，但那些观念，无论他或许认为它们是否被恰当置于文本中，它们释放的效果与情动，都超出他能预见的任何计划，超出任何规划，而且更重要的，超出任何预防。

《Martín Rivas》（那本书，那部小说）对与之互动的诸世界有巨大影响；仅从我们正在研究它、正在谈论它的事实，就知道这一点。博尔赫斯谈作家不同的质量层次与超越可能性时，早已说过：有大量一流作家，永远只会有少数读者。博尔赫斯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似乎在那时想传达：现实无法容忍太多作者成功存在；这对本文想传达的方向，颇有意义与用处。

但让我们暂时回到Blest Gana及他的《Martín Rivas》。就取这一点（‘他的《Martín Rivas》’，那个‘他的’），它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Blest Gana的《Martín Rivas》不同于我们的《Martín Rivas》吗？或者更精确地说：Blest Gana的《Martín Rivas》，不同于每个读过、体验过它的个体各自的每一个《Martín Rivas》。这里有个小注：我区分阅读与体验，因为人读很多，但与一件艺术作品互动是不同的东西，体验无法靠基础机械操作达成；需要某种先前的养成。

先前养成的问题，对一般艺术而言是复杂主题，因为人们似乎几乎常识性地认为，艺术作品可以被近乎自动地体验，仿佛仅仅将身体安排在它面前，就足以领受其恩惠。当然并非如此。体验艺术需要养成，大多极为复杂，需要大量时间获得。相信相反的事情，就会将人类经验的一个本质方面降为琐屑与荒谬。这并不意味着养成平庸的读者不能建

构自己的《Martín Rivas》，因为当我指出养成对正确欣赏艺术的相关性时，并非主张养成的不存在或贫乏，限制了人从作品中获得东西。我想指出的是，那将是一种价值较低、退化、简化，甚至简化到毫无相关性的经验。

当人试图将政治方面引入对现实结构的理解时，事情变得复杂；总体上，大多数时候（或更确切地说，所有时候），政治都摧毁它试图进入的、不同于自身的那些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以政治目的创作的艺术没有价值（《Martín Rivas》无疑是一部朝这个方向的作品），但也正因此，先前才指出，每件作品都不同于创造者寻求的东西。艺术家的追求，藉着无力闭合于自身而实现其目的，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表面悖论的情境：想将某件作品带入艺术家的现实，但这作品，恰在完成的瞬间，取得了对创造者的独立：它不再属于他们，而像一个路西法，挑衅地对创造者说：‘non serviam’，‘我不为你效力。’

每位作者对于其生产的作品，都处于这一情境：对作品再无任何控制。我认为一个问题多少相关：某些起源于霸权文化系统之外的作品，如何似乎被某些标准束缚，使它们无法具有超出我们可称为单纯民俗主义的潜能。这很复杂，因为如果作品要不时更新自身，就需要被纳入一个更庞大、得到广泛接受与合法化的秩序，那么不进入这条回路的作品，就难以完成此种更新，仍困在一张最终极其缩小的象征网络中，只有谈论某个时代极特定现象时，才可能被调用。

此事的两个关键方面由此表达：一件作品或许具有的、我们可称为过度特殊主义（或许是形式的）的东西，以及将作品归入特定时期的倾向。第一点可以说，与作品被生产于（如先前所说）更大众化、霸权的回路之外有密切关系；作品在边缘生产，最终成为根本特征的是，它们在特定语境、由特定的人创造；作品的单纯存在，似乎更多说明是谁生产它，而非作品自身寻求（如果可以恰当使用这个表达）传达什么。

当一件作品更多指向其创造者，而非自身象征潜能时，我们便面对一件复杂事务；一种还原论正被施加于作品—现象，而我们很难将之视为对该作品的理解与讨论的贡献。作品相对于其生产时间遭受的归类，也发生类似情况；创造的时刻恰恰最终占据大部分关注。这里因某种原因而变得有趣的，是作品生产的时代，是其创造发生的时间瞬间。于是，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些能够轻易以完整象征力量，定位于当下或不同于其实现时刻的另一个时间的作品。

这两项限制无疑过度束缚作品可能具有的潜能，因为无法更新自身，使它不能被用来指涉不同于单纯生产语境的东西。这是边缘创作的作品所受的问题；《Martín Rivas》是一部边缘创作。它受制于巨大的还原论，最终有任何相关性的唯一情境，是作为智利历史

某一时期的文学表现；其最大生产力，通常在于被指认为心态的生产者。这种事不会发生于卡夫卡、乔伊斯或三岛的作品，仅举数例。不会发生于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普遍的。

于是，我们可以问，为何有些作者被视为普遍，有些却不是；为何有些作者始终有效，被热烈地重新置入语境、以多种语言再版、改编为不同于文学的媒介，等等；这不可能有简单答案。但无论答案多么困难，我们都有义务发问，因为我们的边缘命运或许部分取决于此。是什么使某些作者指向整体、指向总体性，另一些却不如此？在我看来，他们的主题未必更普遍。如果所关涉的是理解作品能以何种形式在体验者中释放情动，这些就是相关问题。

让作品释放的情动被生产语境过度决定，似乎不太有道理，因为我们事实上理解，这并不穷尽作品，实际上只是作品的开端；作品拥有整整一系列潜能，栖居于一切不只是指向其生产的东西之中。我们甚至可以大胆说，仅指向生产语境的，是作品最不相关、甚至最机械的部分。考虑到欠发达世界语境中生产的艺术，有不小部分将这种状况主题化，使语境往往成为作品内容本身的重要部分，这无疑可能显得有些大胆；当然，这究竟有助、还是无助于改善该语境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同样可争论。

但那些寻求指向总体性的作品，难道最终不也只是指向一幅关于其所谓总体性的乌托邦图像？我的意思是，每种总体性，也是一种关于其所包含之物的歧义，使它因涵盖过多而不再涵盖；就像‘人人都是贼的地方就没有贼’，或一句更合主题的话：‘如果一切都是艺术，就没有什么是艺术。’那么，当我们说，被视为普遍的作品（甚至是古典普遍之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面对一个复杂情境，因为通常被认为证明其伟大的普遍性，实际上可能在显示其缺乏（一种重量的缺乏，一种属于脱离其生产语境者的轻盈）时，事情就被颠倒了。

原本可能被视为缺陷的，如今被纳为有价值的方面。但我们知道一件事：能够做某事，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它；所以，我们能够作一种再阐释、一种诠释操作，将传统上被视为普遍的那些作品置于匮乏情境，并不意味着必须沿此方向前进；首先是因为，并不十分清楚这样能真正让我们（至少此刻）抵达一个有价值的结果。

我们不会通过文本、通过宣传册，去改变决定某种情动能否进入世界的界限，因为那取决于许多当前逃逸于理解的问题；留下的，只有继续：这是未来‘自由者’的任务。一个虚构与理论显露自身始终所是、即同一张面孔的未来；那面孔被时间、意志、以及从不同

之物散发的秩序所标记。说到底，杀死作者并不太难，尽管本文遵循的整条路线始终未能做到；不如说，困难实际上更多位于我们仍置身其中的生产语境；或许，词语应该被激进化。

我们知道，没有解决问题的计划，没有聚焦的方式，没有一种转身而不生后果的方式，没有一个在博物馆里的存在者；它空、满，却空到绝望。我们将形容词放在一旁，因为虚空不应着色，必须保持中性，没有表达性，因为人类倾向于夸大每个姿态；对病态过度预置。于是，人处于边缘，但这并非新事，因为我们总在边缘，总在恐惧与危机中。

他们将身体带给实体，将那些先前被创造、如今不被创造的机器带来；它们能够提议与执行，而木偶只是反应，只能跟随编舞。写作已经穿过简单性的问题；我们尚未克服它，要从一种陌生于我们的记忆的装饰中解放，极其费力。不知战斗将在何种程度上迫近。我们知道（是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宗教回归；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与德国存在主义者早已如此说，尽管他们将许多关切集中于技术问题；那件事不再让我们太在意。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询问人的根基、人的界限、以及人将以何种形式被超越的时代。问题显而易见，树显而易见，错误半透明。永久的对立如今要求我们交代：我们失去了艺术的意义，却未失去艺术本身，它仍在其始终所在之处，在历史中。信息丰裕，我们必须学会用它做些什么。从早晨起，我们将能悬置死亡而不出现；说话与静止将是我们的义务。一种新哲学，通过这一切开辟道路，我们的艺术，艺术，那种建构多于摧毁的艺术。

一切都可被悬置，因为我们能够支撑这个世界，并且我们将能够（在数千年判罚之后）克服作为人类现实构造教条的悲剧。这里有容易的事，但我们热爱快速而浓密的艺术，因此不能背对着说话，不能与消失的神交流；我们呼唤显现的回归。统一是绝对的要求，是中心之力量的明确表现，是支撑边缘、边际者的明确表现；没有栖居中心之物的实用与概念影响，就没有边缘。

艺术中的地狱是形式，它既是我们寻找的，也是我们想逃离的；逃离对象及其狂热精神，物质到绝对无序的程度。关键在于命令与服从的能力，远离技术，一点点缓慢而专注地，最终接受黑暗：总体的黑暗。手边的概念成为艺术，光在形而上学中自毁。这里，后人类艺术能够说出新语言，那些从死亡、从仍潜伏于自思存在者周围的动物性制约因素中解放的存在者的语言。

时间流逝，但材料不逝，表面不逝，理论也不逝；一种等待、自我编程、正常地自我书写，而后缠绕又解缠、打破形式又重建形式的艺术。选择就是死亡，而死亡曾不过一刻，历史中的一刻，一个特定人类缺陷如此表达自身的时刻。我们想要一切：对抗正典，埋葬不理解，混淆计划与文字。阅读是核心。来自下方的注释是核心。翻译改变所写之物的意义，却因此揭示它。词语与武器、记录、鸟与镜子；允许自己被绑缚、被放上桌的构造，那是一种惊人而有尊严的行为。

艺术的现实，是以单一方式、齐声指向肉身与宇宙的东西；一种铭写于大众心灵的东西，一部损坏却有用的电梯。我们需要拼装这必要的艺术，给它词语与舞台，给它相信的凭借，因为它很大程度上靠此运动。于是必须使词语脱离地方，同意必须离开框架、离开本初脆弱、超验二元性；使自己变暗、标记自己，再步入光中。感受实验、着色，感受颜料与内在意义。

如今，调遣能够重新导向（面对面走向中心并组装装置。不可超越者与反向道路）变化、变化之意义、逃离边缘。植物、矿物、计算机，充满软件与未来，充满拯救，充满对单纯逃逸的拒绝。在这一时刻，我们有一项使命：思考一种不以纯然缺乏和谐为基础建构自身的艺术。要出现这种东西，就需要其他艺术家出现，不那么柔软，更朝向重构我们的象征视域。我们需要的强度与效率，或许不会来自艺术学校；它们也许将自己过度封闭于复制预期的地点、被追求的调遣、以及获准反叛的叙事中。

这是一个必须国际性处理的国际问题，毫无疑问，从东京至圣地亚哥。我们需要武器，也需要那个知道自身无限、知道形式尚未抵达其界限与边缘者的凶猛平静。如今，我们所求，是让教堂转变为教堂。让确定之物在符号中物质化，不屈服于意义的缺席，让诗从受过度教育的赘言中涌现。艺术场域的结构性失序，必须由我们释放：少些政治，多些建构作品时的风险。

不看另一面镜子，哲学更新自己，分散自己，弄脏企业衣着，释放被困于公式的天赋。少数人的虚妄，已足以为那些藏在古老正午里的叛逆者打开空间，全部丰裕的表现都从那些目的分心；当确信如今可能置身其中的时间类型时，一切专注都保持无动于衷。所有这些，直接在海湾边缘上演，一个特定海湾、一个特定年份：1984，是一场完美军事游戏的开端。

同一种色彩曾被用来抛弃那些曾是往日骄傲的凶猛巨怪，如今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径直有着自我形象问题的时代的活像：对文字照料过度，线路之间却同样污秽。框在不规则玻璃里的太阳，将能标记新清晨的节奏，如今确已完全嵌入历史过渡。不再有痕迹，留下

那个有限之物声称要强加自身、而对话仅可能从某个特定方向出发的时代。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濒于灭绝的世界的工作，一个被弃绝、判处毁灭的世界，不是因为它的行为，而是因为它与现实完全失联。充满致幻剂，我们能够倒着沉入数字化的列车，沉入它与崇高的亲密联系。在文本谈论形式与理想之间超连接之处，我们却能够只是将目光稍稍打开，读更多那些不宜读的作者；或更确切地说，那些本该传授知识给我们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的作者。如果我们曾前进，那是尽管受了那样的教育仍然前进。

不应诉诸翻译，因为翻译与感官的诱惑密切相关，而感官是一片总被自身恶习取消的中性空间。他们全都远在秩序之外，远在赋予他们起源、意义与存在理由的海洋之外。无限与混乱的混淆，是艺术发展内在的问题。它标志着不可还原的流动，将我们所有人引向一幅总是辉煌的、被容纳的永恒图像。

不懂得如何在没有那不可突破的逻各斯的情况下生活，带着某种份额的罪；那逻各斯邀请敌对意义的形式缩减，邀请义务感的不恒久加速，而多重性似乎对此极为怨恨。正是在河里，艺术的恶习找到其疏离、阅读马勒、作威作福以打开某扇古老之门的方式。为了不触碰死者，我们最终害怕理性可能揭示的东西。归根结底，我们是机器。

雨落下，历史记录暗下去时，我们吃着找到的东西，将视域框入专用空间；我们继续确认的，在未来做下，仔细标记每件作品的标题。或许最大的光亮，来自某种接近审美暴力的方式，从中（从腐蚀性的立场）仍可能有某种散发。仿生人仍行走于我们之间，而某种科学目光似乎想给未来人类的小家，自身并无未来。扩展是总体的，而在粗心观察者看来，最奇怪的是，这一操作自远古以来从未停止发生：一场巨大的千年阴谋。

审美军事化是总体的，也是被那些想打开一个形式视域的人所渴望、所追求的；在那里占主导的是线，而非滑脱。远方哲学家的暮色框架：它从海上想击败近旁的神；圣像跃过已知知识的源头，对那不愿看光诞生的影子撒谎。